

言利

SPEAKING OF PROFIT

包世臣
与19世纪的改革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启微
QIWEI

[美]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

许存健
倪玉平
译
审校

科学文献出版社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言利

SPEAKING OF PROFIT

包世臣
与19世纪的改革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启微

[美]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

许存健 译
倪玉平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 / (美)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许存健译. --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9.5

书名原文：Speaking of Profit: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SBN 978 - 7 - 5201 - 4710 - 1

I. ①言… II. ①罗… ②许… III. ①包世臣 (1775 - 1855)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6801 号

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

著 者 / [美]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译 者 / 许存健
审 校 / 倪玉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61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710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8 - 577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自序

第一次发现包世臣是在 1970 年代末，当时我正在撰写汉口的学位论文。包世臣曾去过汉口，他在文章中称赞汉口发达的冶铁业，可以担负生产武器的重任。包世臣的创新政策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西方汉学家普遍轻视“传统”儒家士人的创新思维。我当时便计划，一旦时间允许便深入研究他。很长时间之后，我才重新回到包世臣的研究，本书便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另一位改革家——陈宏谋（1696 ~ 1771），他活跃于乾隆时期，比包世臣（1775 ~ 1855）早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对陈宏谋的研究经历，不可避免地会让我将包世臣与陈宏谋进行比较。他们二人自清朝以来便一直被视为经世改革家，但陈宏谋生活在“盛世”的乾隆朝，而包世臣活跃于危机四伏的嘉道时期。时代背景的不同，导致两人优先解决的问题也存在差异。

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眼中，包世臣的主要贡献是在漕运和盐政改革两方面。在两次改革中，包世臣提出漕粮和食盐的运输，应该委托给私商，而不是政府，因为商人会为了个人利益按照市场的逻辑运作。在漕粮海运方面，魏源认为从河运到海运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清朝开始了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但在包世

臣看来，这项改革更大的意义在于国家放松了对市场和私人资本的控制。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包世臣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本书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夸大其词。尽管包世臣尊重“逐利”和市场无形的手，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核心关注点一直是维护国家的财政收入。对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陈宏谋而言，财政富足和国家强大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到19世纪早期，包世臣所面对的是积弊丛生、财政匮乏的社会现实。对于包世臣来说，尊重商业市场的力量，恰恰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面对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包世臣早于时人产生了恐慌，因此急迫地想要让国家变得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包世臣上承顾炎武、陈宏谋以及魏源的经世治国理念，同时开启了19世纪后期冯桂芬等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2019年4月

致 谢

在过去的几年，我在许多机构和研讨会上做了关于包世臣的报告，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在每个场合，主办方和听众都极大地帮助了我凝练论点。特别感谢魏丕信教授（Pierre-Étienne Will）、濮德培教授（Peter C. Perdue）、詹姆斯·斯科特教授（James Scott）、林满红教授、王笛教授、姜进教授、盖博坚教授（R. Kent Guy）、万志英教授（Richard von Glahn）、董玥教授（Madeleine Dong），感谢他们的评议和帮助。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委员会的两位匿名评审人为本书的提升给出了非常多的好建议，中心的罗伯特·格雷厄姆（Robert Graham）也为我提供了长期的支持。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Money, Economy, and Polity in the Daoguang-era Paper Currency Debates,” *Late Imperial China* 21.2 (December 2010);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22.2 (December 2011); “Rewriting the Qing Constitution: Bao Shichen’s ‘On Wealth’ (Shuochu),” *T’oung Pao* 98(2012); “Bao Shichen and Agrarian Refor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1(2014)。非常感

谢这些杂志的出版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和博睿出版社，允许我在本书中再次使用这些内容。

能够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和亚洲研究项目的一员，我感到非常幸运。感谢霍普金斯的同事和同学，以及我最重要的朋友梅尔清教授（Tobie Meyer-Fong），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直提供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一如既往，感谢我最重要的支持者 Jill Friedman, Josh Rowe 和 Sara Rowe。

目 录

致 谢 / 1

前言：盛世的终结 / 1

从乾隆到嘉庆 / 2

司法改革：嘉庆帝的维新？ / 6

包世臣与士大夫的经世革命 / 12

第一章 包世臣思想渊源 / 22

早期思想 / 26

常州与传统学术 / 28

第二章 救时之要 / 39

《说储》文本的历史 / 41

包世臣的《说储》 / 46

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 / 49

地方管理 / 54

经济与国家财政 / 59

官员考课制度 / 64

重建清代的统治秩序 / 66

第三章 农业管理与农民税负 / 72

人口与劳动生产率 / 73

农业实践 / 78

产权 / 81

赈灾 / 82

农业与商业 / 87

海外贸易 / 91

国家的角色 / 94

税收与货币改革 / 96

施政实践 / 99

第四章 漕粮河运与海运之争 / 105

漕运体制的积弊 / 106

嘉庆六年的改革建议 / 108

嘉庆二十五年的改革建议 / 109

漕粮海运 / 113

道光危机 / 116

漕运改革的历史意义 / 123

第五章 东方的经济自由主义? / 127

盐政改革的呼声 / 130

包世臣与两淮盐政改革 / 133

包世臣的反思 / 137

盐政与清朝 / 143

第六章 主权货币方案的出现 / 146

白银、鸦片与道光萧条 / 147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 / 150

王鏊及其提议 / 152

包世臣对王鏊提议的评论 / 158

其他主张 / 162

国家与民族 / 165

结语：言利 / 173

参考文献 / 193

译后记 / 210

前言：盛世的终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 18 世纪的康乾盛世，以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首次“开放”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关于 19 世纪上半叶，即嘉庆（1796 ~ 1820）、道光（1821 ~ 1850）两朝，除了鸦片战争外，学者关注得较少。1978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其中关于 19 世纪初的部分由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合著，标题为“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与该书的大部分章节总结领域内的知名研究不同，这部分提供的是全新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研究的时段在英语世界中长期被忽视。^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文章的权威性可能导致了此后很长时间内缺乏新的研究成果，因为鲜有学者认为自己能挑战他们的结论。^②

* 作者曾将这部分前三小节的初稿以《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为题，发表在《清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本书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该译本。——译者注

① 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 - 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7 - 162.

② 中国和西方都缺乏对 19 世纪清朝的研究，参见 Seunghyun Ha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pp. 6 - 11.

这一空白虽然可以理解，却也让人非常惊讶，因为嘉庆朝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议的转折期。关文发所写的嘉庆帝传记，将这个时代直接定义为“从盛到衰”的转折点。^①嘉庆朝出现了直接、复杂且严重的危机，社会上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以往可以遵循祖制的事情变得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内外官员以及嘉庆帝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情况，对当时的状况感到非常沮丧，并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而焦虑。另一方面，从后来的视角看，稍后的人对嘉道社会评价却很高。太平天国以后的记载中，对嘉庆的“黄金时代”充满怀念。在这些记载中，嘉庆朝的官员和士人，包括嘉庆帝本人，给后人留下的是有能力、博闻强识、坦诚且富有活力的印象，但同时又极度忧虑不安。当时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便是本书的主角——包世臣（1775～1855）。

从乾隆到嘉庆

至迟从铃木中正 1952 年的奠基性论著《清朝中期史研究》开始，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学者为我们勾勒了 19 世纪前后清朝出现的相当突然和显著的衰落。^②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人口危机。早在 1793 年洪亮吉就提出，近百年来清朝的人口“不啻增二十倍焉”，但可以耕种的土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马尔萨斯式的“水旱疾疫”，从而通过灾害抑制人口的增长。尽管如此，仍无法缓解长期的生存

① 关文发：《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 30 页。

②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952。

危机。^① 由于溺杀女婴的“主动人口抑制”等行为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调，加之日益贫困的男性无法承担家庭负担，结果导致了让人忧虑的人口问题——光棍数量的增长。^② 此外，曼素恩和孔飞力的研究发现，通过科举和做官向上流动的男性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这被称为后殖民世界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人才过剩”（talent glut）现象。^③

如果说“人才过剩”是繁荣增长带来的危机，当时广泛的环境退化同样也是繁荣导致的结果。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商品粮食需求的增长，长江中游世代的围湖造田可能导致了历史上首次对长江流域的洪涝予以重视，其程度提高到与黄河、淮河一样的水平。经过此前一百年的开垦，山上的表层土壤流失严重，肥力逐渐下降，这导致了民众经济上的不满，并成为白莲教起义的根本原因。^④ 乾隆后期因管理不善，黄河河

① 洪亮吉的著名人口论述由刘广京翻译，收入 Theodore 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pp. 174–176. 有关洪亮吉观点和文本的讨论，参见关文发《嘉庆帝》，第188～194页。

② James Z.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7–51; Ted A. Telford, “Family and State in Qing China: Marriage in the Tongcheng Lineages, 1650–185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1992，第921～924页；Matthew H. 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15 and passim.

③ 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pp. 113–116.

④ Pierre-Étienne Will, “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 la province du Hubei du 16^{ème} au 19^{ème} siècl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68 (1980): 261–287; Peter C. Perdue,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 (August 1982):

工破产，造成运河淤塞，往京城和北部边疆运送漕粮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边疆地区出现了军事威胁，白莲教起义是其中规模最大但并非唯一的。如 1975 年在湘黔边界爆发的苗民起义，标志着该地区数十年来摇摆不定的民族政策最终失败。^① 白莲教运动本身也是涉及多方面的灾难，宗教问题只是暂时驱散，但无法真正镇压下去，到 1813 年又重新爆发。^② 另一方面，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不得不雇佣唯利是图的乡勇民团。但这些民团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导致战争被故意拖延了好几年。^③ 镇压白莲教起义极大地消耗了“盛世”所积累的盈余，并使得朝廷甚至通过令人憎恶的方式来平衡财政收支。^④ 1801 年，年轻的改革者包世臣指出，每一个官员都不得不应付献给上司的规礼。^⑤

经过和珅的多年弄权，整个官僚体系的道德和行政能力都非常低下。在接任皇位后，嘉庆帝将和珅逮捕，并在 1799

747 - 765; 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an River Highlands," *Ch'ing-shih wen-i'i* 3.4 (1975): 63.

① Donald S. Sutton, "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190 - 228.

②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③ Yingcong Dai, "Civilians Go into Battle: Hired Militias in the White Lotus Wars, 1795 - 1805," *Asia Major*, 3rd ser., 22.2 (December 2009): 145 - 178.

④ Elisabeth Kaske, "Fund-Raising Wars: Office Selling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1.1 (June 2011): 69 - 141.

⑤ 参见本书第二章。

年2月赐其自尽。由于没有进一步清理和珅的同党，很多士人对嘉庆帝不满。在清朝政治史上出现了重要的一幕，广受尊重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经成亲王上书，痛斥了新君主的怯懦。洪亮吉最初被判处死刑，但最终改为流放。洪亮吉成为幻想破灭的年轻士人心中的英雄，这些人已经崭露头角，但对自己的职业抱负感到沮丧。^① 洪亮吉绝非个例，青年学者包世臣虽然赞同嘉庆帝关于宽恕罪恶轻微官员的决定，但也请求对国家行政体制进行彻底的清查。这项提议虽然被嘉庆帝忽视，但影响了随后几十年的改革者。似乎可以认为，嘉庆帝在18、19世纪之交整顿吏治的失败，成为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从长时段来看，在晚清的历史进程中，嘉庆朝出现的一些因素被有的学者视为至关重要：政治权力从中央行政机构下降到官僚之外的地方精英手中。孔飞力在1970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地方叛乱研究中，将“中国近代的开始”划定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1850~1860年代。但该书写成十年后，在一篇反思性的序言中，孔飞力承认最重要的转折并非军事活动，而是地方精英开始了抗税运动，这在半个世纪前的嘉庆朝

① 洪亮吉的信件，Theodore 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pp. 172–174. 关于这件事的研究，参见 David S. Nivison, “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S.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09–243; Susan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 (1746–1809): The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受洪亮吉影响的年轻一代士人情况，参见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2).

就已经出现。^① 最近，孔飞力的学生韩承贤（Seunghyun Han）也认为嘉庆初期中央权力的退出，以及与之伴随的地方精英权力的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刻意为之，或者至少是政府默许的。韩承贤发现这一扩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精英在政府捐纳制度刺激下，大量资助地方公共事业；二是中央放松了对名宦与乡贤的管控，相比于和中央的联系，这些人与地方的利益结合更加紧密；三是地方出版业的复兴，例如这一时段市镇志的大量出版，这是自 1770 ~ 1780 年代《四库全书》“文字狱”后对著作审查放松的结果。^②

司法改革：嘉庆帝的维新？

最近一些学术研究对嘉庆朝提出了更为积极的看法，强调朝代革新产生了复兴的效果，至少持续了数十年，也许直到道光萧条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出现新的威胁之前。相较而言，直到今天道光帝仍被视为不成熟且优柔寡断的皇帝。^③ 关文发似乎是为了与百年后的“清末新政”相呼应，将嘉庆初年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嘉庆新政”。^④ 在一篇简短但很有深度的文章中，

①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 - 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Seunghyun Han, "Changing Roles of Local Elites from the 1730s to the 1820s," in Willard J. Peterson,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606 - 648. 关于嘉庆朝地方权力增长的问题，参见 Elisabeth Kaske, "Fund-Raising Wars; Office Selling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1. 1 (June 2011): 90 - 99.

③ 例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

④ 关文发：《嘉庆帝》，第 113 ~ 114 页。

张玉芬将嘉庆初年的政策转向总结为“咸与维新”，米丹尼（Daniel McMahon）将之巧妙地译为嘉庆维新（Jiaqing Restoration），这个短语在当时的语境中有独特的意思。当然，嘉庆帝不得不遵守孝道，并继续实行乾隆帝的政策和措施，以避免自己公开地偏离乾隆帝的轨迹。乾隆帝去世后的第一年，即嘉庆四年（1799）正月，翰林院学士、蒙古旗的法式善在他上呈的新年贺词中，祝贺嘉庆帝“亲政维新”。嘉庆帝对这一表述感到十分恼火，并坚持认为他只是恪遵祖制、率循旧章，法式善因奏事不当而被革职。但同时期的其他人，包括年轻的满洲贵族昭桂同样对所见到的政治改革兴奋不已，并在《啸亭杂录》中将之称为“维新”。^①

许多学者对这次维新过程中的部分内容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是嘉庆帝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联合一致的、旷日持久的并极为成功的行动，将和珅妖魔化为“元恶”，把他作为几十年来贪腐和吏治败坏的唯一负责人。这次成功的运动在历史上是如此经典，以至于今天的历史书写依然受其影响！扳倒和珅意味着将会进行行政改革，但嘉庆帝将自己推到和珅的对立面，希望自己可以恢复“实政”“勤政”，以及最重要的“敏政”。^② 实、勤、敏成为那些年嘉庆帝讲话的基本内

① 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Daniel McMahon,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清华学报》（新竹），2008年第2期。关于昭桂，参见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 139.

② Daniel McMahon,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清华学报》（新竹）2008年第2期。